

欧美人口 经济学说史

◎李仲生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欧美人口经济学说史

李仲生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美人口经济学说史/李仲生著.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3. 5

ISBN 978-7-5100-6103-5

I. ①欧… II. ①李… III. ①人口经济学—经济史—研究—西方国家 IV. ①C9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8423 号

欧美人口经济学说史

著 者: 李仲生

责任编辑: 陈晓辉

出 版: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出 版 人: 张跃明

发 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地址: 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电话: 64077922)

销 售: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24.5

字 数: 566 千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100-6103-5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本书以新兴边缘学科人口经济学说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畴侧重于欧美人口经济学说的产生、发展的历史,或者说,从人口经济学的角度阐述有关人口与经济之间关系思想的历史,同时研究人口变动的经济因素以及人口现象和经济现象的相互关系。本书较为集中地评价了欧美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的人口经济理论和分析模型以及研究方法。

《欧美人口经济学说史》一书大体上以近代和现代欧美人口经济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导线,评述各个学派的理论,力求阐明人口经济学说发展的连续性。在评述各种学说时力求阐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代表人物和学说本身的主要内容并且给予概括性的评价。

全书共分为24章,前10章分别阐述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经济学派、庸俗经济学派、新马尔萨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德国历史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学派的人口经济理论以及早期经济适度人口学说,主要是按照各个不同的人口经济思想流派来阐述各种人口经济学理论。第11章至19章主要从经济学的视角论述了生育率、死亡率、人口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就业、人口转变、经济适度人口、人口投资以及人口迁移等各个领域的人口经济学说。第20章至23章分别概述了南亮三郎学派、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乐观主义以及当代的人口经济理论。最后一章用时期序列分析的方法论述了近代人口经济学说的源流、当代人口经济学说的形成过程以及人口经济学说的确立与发展的历史。

本书紧紧扣住人口与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来评价近代和现代的一百多位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的人口经济学说,并从经济学角度把历史上各位学者的人口观点和经济观点联系起来,把经济理论作为人口经济问题的理论基础,来阐述各位学者的人口经济理论,为人们了解人口经济思想发展史提供了较多的资料,并且从纵横两个方面分析了各种人口经济学说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各种人口经济学说的渊源。

本书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概括地说,主要研究了近代以来欧美人口经济学说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人口经济学说发展史,就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而言,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书得到国家重点学科劳动经济学专项资金的出版资助,以及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冯喜良教授的大力支持,为此表示深深的感谢。在本书的审稿和出版过程中,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编辑以及张明同志提供了帮助和支持,在此特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李仲生

2013年3月31日于北京

目 录

第1章 重商主义的人口经济思想	1
1.1 重商主义的人口经济思想	1
1.2 乔万尼·保泰罗的人口经济思想	3
1.3 托马斯·曼的人口经济思想	4
1.4 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的人口经济思想	5
1.5 詹姆斯·德哈姆·斯图亚特的人口经济思想	7
第2章 重农主义的人口经济思想	10
2.1 重农主义的人口经济思想	10
2.2 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的人口经济思想	12
2.3 理查德·坎蒂隆的人口经济思想	13
2.4 弗朗斯瓦·魁奈的人口经济思想	15
2.5 安纳·罗伯特·雅克·杜尔哥的人口经济思想	17
第3章 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经济学说	20
3.1 古典经济学派人口经济学说产生的背景	20
3.2 威廉·配第的人口经济学说	21
3.3 亚当·斯密的人口经济学说	23
3.4 大卫·李嘉图的人口经济学说	26
3.5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西斯蒙第的人口经济学说	28
第4章 庸俗经济学派的人口经济学说	32
4.1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学说	32
4.1.1 马尔萨斯以前的人口经济学说	32
4.1.2 马尔萨斯生平及其人口经济学说产生的背景	34
4.1.3 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思想	36
4.1.4 马尔萨斯在人口经济思想史的地位	40
4.2 纳索·威廉·西尼尔的人口经济学说	42
4.3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人口经济学说	44
第5章 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经济学说	50
5.1 新马尔萨斯主义及其人口经济学说	50
5.1.1 新马尔萨斯主义	50

5.1.2	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经济学说	51
5.2	弗朗西斯·普莱斯的人口经济学说	54
5.3	马尔萨斯主义联盟的人口经济学说	56
5.3.1	马尔萨斯主义者联盟	56
5.3.2	马尔萨斯主义者联盟的人口经济学说	57
5.4	乔治·德赖斯戴尔的人口经济思想	59
第6章	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经济思想	62
6.1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的人口经济学说	62
6.2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的人口经济学说	68
6.3	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历史影响	72
第7章	德国历史学派的人口经济学说	74
7.1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人口经济学说	74
7.2	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罗雪尔的人口经济学说	76
7.3	阿道夫·瓦格纳的人口经济学说	78
7.4	保罗·蒙伯特的人口经济学说	80
第8章	早期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82
8.1	早期经济适度人口学说的思想渊源	82
8.2	埃德温·坎南的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84
8.3	克努特·威克塞尔的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86
8.4	卡尔·桑德斯的经济适度人口密度学说	89
第9章	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经济学说	92
9.1	阿弗里德·马歇尔的人口经济学说	92
9.2	约翰·贝茨·克拉克的人口经济学说	95
第10章	凯恩斯学派的人口经济学说	99
10.1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人口经济学说	99
10.2	阿尔文·哈维·汉森的人口经济学说	103
10.3	琼·维尔丽特·罗宾逊的人口经济学说	106
第11章	生育率的经济学说	109
11.1	哈维·莱宾斯坦的成本与效用比较学说	109
11.1.1	生育率的微观经济理论	110
11.1.2	孩子的成本与效用	113
11.1.3	孩子的成本与效用解释	116
11.1.4	防止生育的成本与收益	117
11.1.5	边际孩子的合理选择	118

11.1.6	生育的经济决策	120
11.2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孩子数量质量替代学说	124
11.2.1	对孩子需求的学说	125
11.2.2	选择孩子的微观经济分析	127
11.2.3	对孩子数量的需求	128
11.2.4	对孩子质量的需求	129
11.2.5	对孩子数量和质量的选择	131
11.3	理查德·A·伊斯特林的生育率供给与需求学说	133
11.3.1	影响孩子供给和需求的内生因素	134
11.3.2	现代化对孩子的供给和需求的影响	135
11.3.3	生育率抑制的临界假说	137
11.3.4	生育率决定的供给——需求理论模型分析	139
11.4	朱利安·林肯·西蒙的收入对生育率影响的学说	140
11.4.1	收入对生育率的影响	140
11.4.2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对生育率的影响	141
11.4.3	收入再分配对生育率的影响	143
11.5	约翰·G·卡德威尔的代际财富流学说	144
11.6	对生育率经济学说的简评	145
第 12 章	死亡率的经济学说	148
12.1	塞缪尔·普雷斯顿和 L. 鲁兹卡的死亡率经济学说	148
12.2	金斯利·戴维斯的死亡率变动分析的“经济决定论”	151
12.3	安斯利·科尔和埃德加·胡佛的死亡率变动分析的“经济决定论”	152
12.4	保罗·舒尔茨的死亡率的“健康投入—产出”	154
第 13 章	人口与经济增长理论	157
13.1	罗伊·福布斯·哈罗德的人口与经济增长学说	157
13.2	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的人口经济增长学说	159
13.3	约瑟夫·约翰·斯彭格勒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学说	162
13.4	鲍利斯·采扎列维奇·乌拉尼斯的人口增长促进经济增长学说	163
13.5	汉斯·W·辛格和雷格那·纳克斯的人口与经济增长学说	165
13.6	哈维·莱宾斯坦的人口与经济增长学说	167
13.7	罗伯特·默顿·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和人口增长学说	168
13.8	理查德·伊斯特林的人口与经济增长学说	171
13.9	理查德·纳尔逊等的低级均衡陷阱理论	172
第 14 章	人力资本理论	177
14.1	人力资本理论形成的思想渊源	177

14.2	西奥多·威廉·舒尔茨的人力资本学说	178
14.3	加里·斯坦利·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	182
14.4	雅各布·明瑟尔的人力资本理论	185
14.5	爱德华·富尔顿·丹尼森的人力资本学说	187
14.6	保罗·罗默的人力资本学说	189
14.7	罗伯特·卢卡斯的人力资本学说	192
第15章	就业理论	196
15.1	让·巴蒂斯特·萨伊的市场法则理论	196
15.2	阿瑟·塞西尔·庇古的就业学说	198
15.3	费利浦斯对失业与通货膨胀的说明	200
15.4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然失业率假说	202
15.5	供给学派的就业理论	204
15.5.1	供给学派与阿瑟·拉弗的就业学说	204
15.5.2	马丁·费尔德斯坦的就业学说	207
15.6	理性预期学派的就业理论	208
15.6.1	理性预期学派的形成与就业学说	208
15.6.2	罗伯特·卢卡斯的政策无效性命题	209
15.7	新古典综合派的就业理论	211
15.7.1	詹姆斯·托宾的就业理论	211
15.7.2	约翰·理查德·希克斯的就业理论	213
第16章	人口转变论的经济学说	217
16.1	人口转变论形成的历史背景	217
16.2	阿德尔费·兰德里的人口转变论经济学说	219
16.3	沃恩·汤普森的人口转变学说	221
16.4	弗兰克·华莱士·诺特斯坦的人口转变论经济学说	221
16.5	安斯利·科尔和埃德加·胡佛的人口转变论经济学说	224
16.6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和巴拉茨·赫里克的人口转变论经济学说	224
16.7	查利斯·布莱克的人口转变经济学说	226
第17章	当代经济适度的人口学说	229
17.1	阿尔弗雷德·索维的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229
17.2	戈拉·俄林和修桑·希尔·科克兰的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233
17.3	帕特里克·纪尧姆的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237
17.4	保罗·安东尼·萨缪尔森的经济适度人口学说	238
17.5	J. D. 皮切福特的福利适度人口学说	241
17.6	詹姆斯·爱德华·米德的福利适度人口学说	243

第 18 章 经济学视角的人口投资学说	247
18.1 西奥多·威廉·舒尔茨的经济学视角人口投资学说	247
18.2 阿尔弗雷德·索维的经济学视角人口投资学说	251
18.3 A. 克瓦沙的经济学视角人口投资学说	252
第 19 章 经济学说中的人口迁移理论	255
19.1 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人口迁移的经济模式	255
19.2 古斯塔夫·拉尼斯和费景汉的人口迁移的经济模式	259
19.3 迈克尔·托达罗和约翰·里斯·哈里斯的人口迁移经济学说	263
19.4 西奥多·威廉·舒尔茨等人的迁移投资与收益理论	268
19.5 戴尔·乔根森的农业人口迁移学说	269
19.6 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的人口再分布与经济发展学说	272
19.7 卡林顿的经济因素人口迁移模型	272
19.8 I. S. 劳瑞的人口迁移引力经济模型	274
19.9 韦勒布·泽林斯基的人口移动转变学说	275
19.10 布林利·托马斯的资本与劳动力迁移模型	276
19.11 约瑟夫·约翰·斯彭格勒的国际迁移经济学说	278
第 20 章 南亮三郎学派的人口经济学说	280
20.1 南亮三郎的人口经济学说	280
20.2 大渊宽的人口经济学说	283
20.3 森岗仁的人口经济学说	287
第 21 章 现代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经济学说	291
21.1 P. 皮尔逊和 F. 哈珀的人口压力与食物供给论	291
21.2 威廉·福格特的人口压力与资源耗竭论	293
21.3 J. 赫茨勒的人口压力与经济发展论	295
21.4 保罗·埃利奇的人口爆炸与生态环境恶化论	297
21.5 奥雷里奥·佩切伊的人口爆炸与资源减退论	299
21.6 哈雷·鲁宾逊的人口爆炸与资源枯竭论	301
21.7 丹尼斯·梅多斯等的人口与经济增长极限论	303
21.8 对现代马尔萨斯主义人口经济学说的评价	312
第 22 章 乐观主义人口经济学说	316
22.1 赫曼·卡恩的人口经济学说	316
22.2 朱利安·林肯·西蒙的人口经济增长学说	320
22.3 对乐观学派人口经济增长学说的简评	327
第 23 章 当代的人口经济学说	330
23.1 威廉·布赖恩·雷德韦的人口经济学说	330

23.2	阿德尔费·兰德里的人口经济学说	331
23.3	冈纳·缪尔达尔的人口经济学说	332
23.4	约瑟夫·约翰·斯彭格勒的人口经济学说	334
23.5	鲍利斯·采扎列维奇·乌拉尼斯的人口经济学说	337
23.6	金斯利·戴维斯的人口城市化学说	338
23.7	A. 克瓦沙的人口再生产与经济发展学说	339
23.8	安斯利·科尔的人口经济学说	342
23.9	B. C. 斯捷申科的人口过程经济学说	343
23.10	安格斯·麦迪森的人口经济学说	344
23.11	德怀特·H·波金斯等的人口经济学说	347
23.12	戴维·N·韦尔的人口经济学说	350
第24章	人口经济学说的产生与发展	355
24.1	近代人口经济学说的源流	355
24.2	当代人口经济学说的形成过程	358
24.3	人口经济学说的确立与发展	360
24.4	人口经济学说的研究范畴	363
主要参考文献		367

第1章 重商主义的人口经济思想

重商主义^[1] (mercantilism) 是16—18世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风行于欧洲, 并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经济学说体系, 该名称最初是由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 一书中提出来的。这一时期商业资本兴起, 促使西欧封建自然经济瓦解, 各国国内市场统一, 并通过对殖民地的掠夺和对外贸易的扩张积累了大量货币财富, 推动了工场手工业发展, 因而产生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要求的重商主义经济思想。它主张应由政府控制经济, 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竞争, 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

重商主义者的研究领域是商品流通领域, 他们从商品资本家的角度阐述经济关系。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 金银就是货币。他们还强调积累金银货币和对外贸易的重要性, 认为国家的繁荣依赖于贵金属的供应, 贸易的全球规模是不可改变的。贵金属所代表的资本量可通过多出口少进口来增加, 认为财富的真正源泉是对外贸易, 要获取更多的金银财富只有在国际贸易中保持较大的“顺差”, 也就是说出口额必须较大幅度地超过进口额。因此, 重商主义者主张在国家的支持下发展对外贸易, 加速原始资本积累。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意大利的乔万尼·保泰罗 (Giovanni Botero)、法国的让·巴蒂斯特·柯尔培尔 (Jean Baptiste Colbero) 以及英国的托马斯·曼 (Thomas Mun) 和詹姆斯·德哈姆·斯图亚特 (James Denham Steuart) 等人。在重商主义的人口经济思想体系中, 主要讨论人口与财富之间的关系。

1.1 重商主义的人口经济思想

从16世纪到18世纪欧洲出现了重商主义的经济时期。中世纪分权性的庄园经济被瓦解, 为了增强国力, 许多思想家主张富国强兵, 积累财富, 强化军事力量, 要健全作为统一国家的官僚制度和军备扩张, 必须积累财富, 而积累财富又必须征收国民税金, 通过对外贸易来摄取财富。为此, 重商主义全面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同时为了富国强兵, 主张人口增长是必要的。

显而易见, 在重商主义时期, 无论是人口经济思想, 还是人口经济政策都倾向于繁殖众多人口, 这与当时的背景有关: 由于鼠疫等不治之症的流行和百年战争等原因, 欧洲各国的人口大量减少; 重商主义者为了发展对外经济贸易, 大力发展本国以劳动密集型生产为特点的工场手工业, 需要众多的劳动力; 各国为了建立统一的国家, 争夺海外市场 and 殖民地, 需要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因此, 在这样一个重商主义时代, 追求众多的人口不仅是君主实现王权强大的手段, 也是新兴的民族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标志。另

一方面，众多的人口又是目的本身，这表现为重商主义者把人口与财富等同起来。因为在他们看来，人口的增加会提高每人平均的实际收入。

重商主义者把人口看作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源泉和国力强盛的标志，因而主张人口增加。这是人口经济思想史上出现的早期人口乐观主义思潮。他们从增加货币财富和发展商业资本主义的利益出发，把人口视为货币财富生产者的来源，又把劳动力人口视为商品实现的条件，因而鼓励人口增殖。重商主义还强调了国家财富的重要性，并把货币财富作为财富的唯一形态，而对外贸易是一国财富的唯一来源，只有通过对外贸易吸收他国财富才能增加本国财富。

基于上述理论，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对国内外经济实行全面干预。主张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以谋求贸易顺差，主张实行重出口产业的产业政策和低工资的消费政策，限制国内非生产部门的发展，增加国家和商业资本的财富积累。

当时，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国家的经济繁荣以及国力的增强，而且劳动成为其重要的手段，因而在生产要素中重商主义最重视劳动力。生产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对于劳动力的增加及其雇佣。对重商主义者来说，经济政策关心的不是人均产量而是总产量，而只有增加劳动力才能增加总产值。为达到此目的，必须以人口增长为基础，因为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能降低生产价格和带来低工资的现象。而低价格有助于增强国际竞争力，使贸易收入有盈余，促进货币流通，增加财富的积累。

重商主义为了适应其经济政策的目的采取了积极吸引外国移民的策略。当时，国外移民是很受欢迎的，因为除了劳动力外，还带来资本、新事业和先进的生产方法。从经济效益上看，国外移民的流入可以增加本国的劳动力资源，缓和劳动力不足，增加对商品的需求，由此产生了更有效率的经济效益。与此相反，原则上禁止向国外移民，因为会造成人口的流失和技术的外流，特别是技术人员的外流，使迁出国产生专业技术人才短缺，减少开发和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影响本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如上所述，在重商主义经济体制中长期的人口增长左右着产量的增减，所以欧洲各国积极采取人口增长的措施，奖励人口的增加，一般地说，就是鼓励早婚、多育，歧视独身和不育者。重商主义者认为人口增加除了提高产量外，还可以增加税收，人口密度的提高还可以刺激经济活动，带来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体的人口增长对策是：提高出生率；降低结婚年龄和提高结婚率；降低死亡率；减少和禁止向外移民；奖励国外移民的迁入等，并通过赋予特权、支付补助金、利用各种惩罚乃至剥夺资格等手段来实施人口政策。

事实上，重商主义的人口增长倾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自有其合理的一面，特别是欧洲连年的战争、中世纪鼠疫的猖獗以及自然灾害的频发导致欧洲人口迅速减少，其表现是劳动力人口严重不足。在当时以手工劳动为主的条件下，这种人口减少妨碍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人口就是财富的思想本身是片面的，因为人口作为生产的主体除了创造物质财富外，还是消费者，人口增长过快，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的速度。重商主义者大胆地、绝对地追求人口数量的思想，从长远看是缺乏理性的，背离了西方自古以来追求适度人口的传统。尽管如此，重商主义较早地提出人口增长受生活资料限

制以及人口众多是国家富强的源泉等人口经济学说,对近代前期的人口经济思想和古典经济学派的产生和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1.2 乔万尼·保泰罗的人口经济思想

意大利早期重商主义者乔万尼·保泰罗(Giovanni Botero, 1540—1607),早年曾在罗马专科学校攻读哲学,后来研究政治和经济问题。当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随着贸易的扩大、科学的发明,从萌芽、发展到日渐壮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第一个论述人口经济论的是保泰罗。他的主要著作有:《关于城市的伟大和壮丽的原因》(简称《城市论》,1588)、《国政论》(1589)和《国政论补遗》(1589)等。保泰罗在上述著作中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对人口经济问题的看法。他的人口经济思想主要反映了15—16世纪意大利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也反射出当时意大利半岛人口停滞的状况。

保泰罗的人口经济思想主要见于他的《城市论》与《国政论》两部著作中。他在论述人口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时指出:“拥有众多臣民的统治者,也会拥有丰富的货币。这是因为统治者拥有的人民愈多,统治者可以征收的贡税也就愈多,这样统治者的财宝就日益增多。意大利和法国都没有金矿和银矿,可是他们拥有的金银却比欧洲任何国家都多。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的人口十分稠密,他们的贸易和商业可以从地球上每个角落里吸收货币。”^[2]他虽然认为,人口是财富的源泉,但是他并不认为人口应无限增加。

在保泰罗看来,人口规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和力量的重要源泉。因为有了众多的人口,不但意味着拥有充足的兵源,还具有足够的劳动力和消费市场,人口越多,对国家越有利。其理由是,人口增长意味着军事力量的增强,税收的增多,通过贸易获得更多的金钱,进而通过开垦土地使粮食和原料的供应增加。从中世纪^[3]末期的14世纪开始,由于战争和鼠疫流行,意大利丧失了大量的人口,因此,他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始于对意大利人口增长的关心,针对意大利人口的衰退状况,保泰罗提出了一些奖励人口增加的政策建议。

保泰罗认为要增加人口,就要发展农业、工艺业和其他产业。这是因为人口的生存依赖于各种产业,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有赖于产业产量超过自然产品。在增加人口方面要提高适龄人口男女的结婚率和出生率;另一方面则要努力使死亡率降低,特别是儿童和婴儿的死亡率。

保泰罗《城市论》中对人口增长与停滞机制进行研究,他认为人口规模的变化受两个因素的影响,即人类的“生殖力”和“供养力”。人类的“生殖力”虽然是无限的,但“供养力”即生产它的土地的地力和从他国采集食物的能力是有限度的,所以人口要受生活资料的限制。当保泰罗谈到罗马人口的停滞时指出,罗马人口的生殖力虽然未变,但供养力却不能扩大,结果妨碍了人口增长。生殖力与供养力的不均衡使死亡率增高,结婚减少。他还谈到了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交通是否便利,以及战争等自然的、经济的因素都是影响人口增长的因素,但生活资料的多寡是影响人口增长的首要因素。

另一方面,保泰罗在《国政论》中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产品不足而限制了人口增长,因而主张应加速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在这个时期通过灌溉系统的改善、土地的开垦等手段,提高了土地生产率;通过接受有技能的移民,实现了经济多元化,促进了工业开发。

值得注意的是乔万尼·保泰罗早在16世纪就指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人口增长又受该国经济的限制。这使保泰罗在西方人口经济思想史上占有较重要的位置。他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众多的人口比其他要素都重要的认识是重商主义在人口问题上的典型看法,也是当时意大利经济发展对人口增长要求的必然反映。保泰罗对人口衰退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而且针对性很强。而他有关“生殖力”和“供养力”的论说较深刻地揭示了“生殖力”和“供养力”之间的矛盾,这一立论又成了人口论的确立者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先驱。同时,在保泰罗的著作中还可以看到人口经济论的萌芽。

1.3 托马斯·曼的人口经济思想

托马斯·曼(Thomas Mun, 1571—1641)是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英国贸易差额说的主要倡导者。他出生于伦敦的一个商人家庭,早年从商,成为英国的大商人、商业资本家。1615年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董事,后又任政府贸易委员会的常务委员。托马斯·曼虽然是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但著述不多,其代表作是1621年出版的《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A Discourse of Trade from England to the East Indies*)。1630年,托马斯·曼把该书改写为《英国的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后于1664年出版。这部著作被誉为重商主义的《圣经》。在这一著作中,商业资本的成熟经济思想得到了系统和充分的阐述。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曾称这一著作“不仅成为英格兰而且成为其他一切商业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准则”。卡尔·马克思则认为该书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因此,如果说重商主义具有一部划时代的著作,那么就是托马斯·曼的著作。

16世纪,早期重商主义者禁止金银货币输出的政策仍在英国占支配地位,他们在17世纪初期猛烈抨击东印度公司在对外贸易中大量输出金银的做法。为了反驳这种责难,1621年,托马斯·曼发表了《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一书,论述东印度公司输出金银买进东印度地区的商品,再转卖到别国去,所换回的金银远比运出的多得多。这表明托马斯·曼已摆脱禁止金银输出的旧思想。在该书中还阐明了他的人口经济思想。他认为要拓展有利于英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各种产业,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而需要更多的人口,以增加国民财富。托马斯·曼认为,在对外商战中,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劳动力就越多,可以输出换回金银的商品也就越多,因此,“在人数众多和技艺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业繁盛和国家富庶的”^[4]。这种人口众多会带来商业兴旺和国家富强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当时资本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大量的资源有待于开发,而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充足有利于发展商业,提供广阔的消费品市场。

在托马斯·曼看来,商业的兴旺与否取决于对外贸易和本国贸易。为了保证对外贸

易的顺差,他提出并证论了应该采取的各种措施。他主张尽可能扩大本国商品出口和减少对外国商品的消费,减少奢侈品进口,扩大经济作物的耕种,力求在饮食和服饰方面做到自给自足。他还要求消除不利于出口的各种措施,促进本国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多出口制成品,减少原料品出口,减免出口商品的税收,使出口商品能以低廉价格来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商业的兴衰依赖于人口数量的规模和人们消费能力的强弱。实际上,商业的兴旺与衰败取决于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规模,而消费者的需求总量主要取决于消费者数量或人口数量的大小;其次是人均消费能力的强弱。可以看出托马斯·曼在商业与人口关系问题上的见解具有独到之处。在当时商业不够发达的条件下,商业的兴衰与否可影响这一地区或国家的就业以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进而作用于人口规模。

托马斯·曼还探讨了对外经济贸易与就业的关系。他认为,一国或一地区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有利于就业,特别是给贫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其就业条件。他举例说,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从东方国家进口生丝等原材料,使英国的丝织业得以迅速发展。这不仅使英国通过出口丝织产品而挣回大量的贵金属,而且使人数众多的贫民得到较多的就业机会,维持和提高生活水平。托马斯·曼还尖锐地指出,面对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英国出现的大量移民,英国政府负有维持人民,特别是贫民生活和健康的责任。

托马斯·曼作为英国重商主义的集大成者,其重商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国际贸易差额论。他认为金银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而对外贸易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为了实现国家外贸出口,增加本国货币积累的目的,国家要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上述目标的实现。他建议国家采取有效政策和措施,其中主要是保护关税政策,以奖励输出,限制输入。他的观点反映了英国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为了扩大出口,作为晚期重商主义代表的托马斯·曼已关注商品生产的发展,从而为英国古典经济学从流通领域转向对生产领域的研究做了思想准备。虽然他没有专门对人口经济问题进行考察。但是,他从重商主义的立场出发,在探讨国际贸易对英国经济的影响时,从若干不同的视角谈到商业与人口规模、对外经济贸易与就业的关系等人口经济问题,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这是他对欧美人口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贡献之一,对后来英国古典经济学派人口经济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有较深远的影响。

1.4 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的人口经济思想

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Jean Baptiste Colbero, 1619—1683)是晚期重商主义在法国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出生于法国呢绒商人家庭,早年对商业有浓厚的兴趣。曾任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兼管工商农业及海军等工作。在科尔贝尔当政期间,他推行了一系列重商主义政策,其经济观点及政策主要是:改革税收制度,将实物税改为货币税;发展对外贸易,鼓励本国商品出口,减少外国商品进口;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扩大商品出口,提供低利率贷款,扶植本国工场手工业,促进工业发展,禁止原料输出,对

外国进口商品课以重税；建立特许贸易公司，促进海外贸易发展；实行殖民扩张政策，争夺世界市场和殖民地等。科尔贝尔作为当时法国的经济决策人，重商主义的实践家，被称为科尔贝尔主义，使法国的重商主义成为欧洲其他国家重商主义的典范。



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

科尔贝尔当政期间致力于重建法国经济和法国的对外扩张，其重商主义政策对法国工商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法国也在路易十四时期称为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其海外扩张也一度达到顶峰，从而成为欧洲其他列强效法的对象。而科尔贝尔作为重商主义的实践家，不像其他重商主义者那样著书立说，但他的经济和人口的观点是鲜明的，主要体现在他从政时期颁布的各项财政经济和对外贸易的法令和布告等。

科尔贝尔在论述法国人口经济问题时指出，一国所拥有的货币数量，决定该国的财富和军事政治实力。由于流通于欧洲的货币总额是一定的，法国若想富强，必须设法从其他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取得货币。而法国当时的富裕与强大是与法国拥有众多的人口密切相关的。相比欧洲各国，法国的人口居欧洲第一位。所以科尔贝尔倾向于鼓励法国人口继续增加。在科尔贝尔看来，人口众多既有利于发展工场手工业，又可以促进法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使更多的硬通货通过贸易顺差源源不断流入法国，从而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

为了促进法国人口的增长，科尔贝尔提出并采取了一系列刺激人口增长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积极鼓励外来移民，禁止向国外移民，对外迁移只能流向本国的殖民地；给予早婚者和多育者以奖励和免税的特权，对独身者课以重税，劝阻年轻人当僧侣和修女；大家庭可以获得政府津贴，有 10 个或 12 个以上的孩子的父亲，每年可以分别得到 300 或 400 里弗尔的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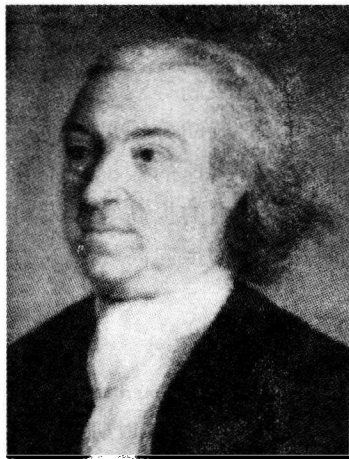
此外，科尔贝尔还采取了一些增加就业人口、调整就业人口结构的措施。这方面的措施包括：奖励年轻人从事生产性劳动，使他们在从事生产性劳动中得到更多的益处；限制从事僧侣、金融和法律等非生产性劳动职业的从业人数；鼓励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青年劳动力转移到农业、工商业和军事等；取缔社会上的流浪者、乞丐等无业游民，使他们转化为从事生产的劳动人口。他试图用调整从业人员的产业结构来促进法国的经济发展。

让·巴蒂斯特·科尔贝尔作为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和实践家，在他执政期间所推行的人口经济政策是他关于人口经济问题的观点从理论走向实践的必然结果。这些政策对当时法国工商业和农业的发展，以至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都起到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但他实施的其他经济政策，如不断增加税收，禁止本国农产品输出，鼓励外国农产品输入，以降低农产品价格、减少工业成本等，采取的是以牺牲法国农民利益来发展工商业的策略，使许多农民生活贫困，农业停滞不前，也使法国人口大量减少。据统计，到了路易十四晚期，法国的人口比他当政初期减少了约 $1/7$ ，总人口由 2000 万减少到

1500 多万。显而易见,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和人口政策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反而以失败告终。到了 17 世纪中后期,科尔贝尔的重商主义政策大多被废除,但是重商主义实践在法国的影响还持续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1.5 詹姆斯·德哈姆·斯图亚特的人口经济思想

詹姆斯·德哈姆·斯图亚特^[5] (Jame Denham Stuart, 1712—1780),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末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家庭。他在经济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 著述甚多, 马克思称他是“第一个试图建立经济学体系的不列颠人, 是亚当·斯密进入经济殿堂的领路人”。代表作为 1767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他的经济学说具有两面性的特征, 一方面带有重商主义的色彩, 另一方面是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前驱者。斯图亚特在这部代表作中较系统地研究了价值。他指出商品的价值通常是由耗费在生产中的必要劳动量调节的, 初步提出了劳动量的概念; 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坚持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他在货币理论中探讨了货币的职能, 发现了货币流通的规律, 对英国古典货币理论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除此之外, 他在这部代表作中还论述了人口增长与财富、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以及劳动者的分工等人口经济问题。



詹姆斯·德哈姆·斯图亚特

斯图亚特主张增加人口, 并强调人口会带来许多经济上的效益。他认为, 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的多寡, 由该国或地区所拥有的金银等贵金属的数量来衡量, 要获得更多的金银, 就必须扩大出口贸易, 而要增加出口贸易量, 就需要更多的劳动者从事劳动生产, 而且人口和金银又是建立军备和巩固国防的要素。所以主张增加国家的人口, 从而增加工资劳动者。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较多金银等贵金属, 但人口较少, 那么这个国家或地区会在对外贸易上因为劳动力不足而处于劣势, 其原有的金银会因为贸易逆差而流出, 逐步变得贫穷。相反, 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原来并不富裕, 拥有很少的贵金属, 但由于人口众多, 人口增长速度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由于人口规模大和劳动力人口充足, 其对外贸易提高, 可依靠较廉价的劳动力使其外贸产品在外贸市场上具有强大竞争力, 从而通过各种产业所生产的大量外贸产品换取大量的金银等贵金属, 使这个国家或地区变得繁荣昌盛。

显而易见, 斯图亚特的这种观点在重商主义时代是正确的。但自从资本主义在欧洲和北美等地区得到较快发展后, 世界市场已经基本形成, 对一些人口规模庞大且劳动力人口充足的贫穷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斯图亚特认为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之间要保持一定的比例。他指出动物界中禽兽的繁衍和它们的食物成比例, 人类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即食物增加, 人口也增加, 食物减少, 人口也减少, 人类的繁殖和其所